

“雅俗之辩”的幕后：明代尺牍选本中文学话语的民间化转向

梁富丽

（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明代尺牍选本的编撰与流行，标志着传统文学话语体系从士大夫精英阶层向民间社会的深刻转向。王世贞《尺牍清裁》以“清”为旨趣，通过对历代尺牍的辑选，构建起一套以复古、雅玩为导向的书写范式。明末以山人群体为代表编选的尺牍选本中大量收录商贾往还、市井应酬、家事嘱托等庶民生活书写，使尺牍文体从士人酬唱的雅艺转化为社会交往的实用工具。同时，编纂者通过解释字词、评点尺牍、摹写尺牍活套等措施倡导实用的书写理念，推动文学语言向通俗化、口语化嬗变。这种转向不仅是晚明商品经济勃兴下市民文化崛起的投射，更折射出文学权力下移过程中民间话语力量的生长。然而，清代乾隆朝推行的文化整饬政策，尤其是对民间尺牍选本的禁毁与规训，造成了这一转向的断裂。朝廷通过《四库全书》编纂系统清理“鄙俚”尺牍文本，斥其“文格卑弱”“有乖雅正”，最终导致文学话语权再度向权力中心聚敛。

关键词：《尺牍清裁》；尺牍选本；文学话语；文化下移

关于王世贞《尺牍清裁》的选文及其特点，学界已有不少研究^①，都认为其不是尺牍指南一类的通俗读物，而是严谨而自成体系的文章范本，王世贞希望藉此建立一部复古书牍史。作为明代第一部尺牍选本，《尺牍清裁》为后代尺牍总集的编纂确立了典范。但随着明中后期社会消费文化的发展，士商界限的弱化，尺牍选本呈现出新的、市民阶级的消费特点，关于这一点，前辈学者已有相关研究，如浅见洋二认为明代古今尺牍总集的编纂，反映的应是中晚期整个知识系统之变^②；陈晨认为尺牍总集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与文化消费的双重繁荣^③。尺牍多写日常生活，多属私事，晚明人称作“如面谈”。明中期以后，一些文人逐渐意识到尺牍在社会中下层的幕僚佐吏乃至普通大众的社会交际中的重要功能，认为其是冲击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利器，体现出社会层级、文化的多元建构与儒学边缘化^④。那么明代前后期尺牍选本呈现出怎样的差别呢？本文希望通过结合尺牍的综合特性，论述明代前后期尺牍选本在雅俗之间的转向以及背后呈现的话语权的转向，以期推进对明代尺牍选本更深入的认识。

“尺牍”一词出现较早，但直到明代才出现专门的尺牍选集。尺牍之名始于汉代。据现有文献史料的考证，“尺牍”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后的太史公传赞“缙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⑤自春秋以来，尺牍文献日益增多，于是从南北朝开始编纂的文章总集开始，尺牍作为一种文章体裁逐渐成为—种单独的文献类型。南朝梁萧统—所编《文选》为现存最早—部古代文章总集，其中所收文章体裁计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

^① 参见：陈晨：《书牍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车祎：《明代尺牍总集的编纂方式及其问题学意义》，斯文（第八辑），2022年3月。

^② 浅见洋二：《文本的“公”与“私”——苏轼尺牍与文集编纂》，文学遗产，2019年第5期。

^③ 陈晨：《论明代书牍总集的类型及其他》，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④ 参见：苗民：《论明代中后期的散体尺牍观——兼与四六启观之比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论中晚明的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陈广恩、邵婍：《古代尺牍文献的流传脉络——兼论〈中州启札〉从日用到专集的性质演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8期。

^⑤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17页。

弹事、笺、奏记、书等三十八类，其中“书”类中有《李少卿答苏武书一首》等书记，为尺牍专类，其他如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等文章体裁或与尺牍相同，或与尺牍类。《文选》一书的体例编排，开了尺牍体裁在总集目录中设立专类的先河。唐宋以降，尺牍也多编入别集之中，如唐代刘禹锡的文集《刘宾客文集》中即有书、启等文章体裁。又如《欧阳文忠公集》中曾将尺牍类分为书启和书简类，这就开了尺牍文献在别集目录中设立专类的先河。在明代之前，尺牍往往多编入总集和别集之中，自为一集者少。因此在明代以前，历代群书书目中尚未有为尺牍单独设类者。自明代开始，尺牍专集开始出现，反映在书目中，就有了尺牍类目。明代嘉靖年间高儒编就的《百川书志》，其中集部下细分有“启札”类，这是较早为尺牍文献设立专类的群书目录。

一、复古与立范：王世贞《尺牍清裁》的编纂目的

明代中叶以后，受博学思潮的影响，学者多倡行“博学以明道，明道以致用”，强调知识的全面性与丰富性，以振当时空疏学风。王世贞也不例外，其在作品中多次强调“博识”，如《弇州史料》写到：“该博畅达”^①。对于相关资料的收集增补，集中反映在相关作品的成书过程上，部分作品如《尺牍清裁》，前后三次增补，历经十余载才最终成书。王世贞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辑成、隆庆五年(1571)续辑的《尺牍清裁》是他专门为学文者所编写的一部著作。

王世贞的《尺牍清裁》是在增补杨慎《赤牍清裁》的基础上成书的，该书编成于隆庆五年(1571)，距初编刊刻已十三年。之所以不断增补，王世贞在《重刻尺牍清裁小序》中自序到“时时觉有挂漏”。关于该书的成书过程，其在《尺牍清裁序》中写到：“西蜀杨用修，少游金马，晚戍碧鸡，倾浮提之玉壶……爰荟斯篇，凡十一卷，命曰《尺牍清裁》。……仍加增茸，及自唐氏迄今，词近雅驯亦附于后，更为二十四卷，藏之棣中。”^②以杨慎著作为基础，增辑唐代到明代的尺牍，成书二十四卷。之后，王世贞仍不断搜集增补，最终成书六十卷并补遗一卷：“是书盖因杨慎原本而增修之，慎所录自左史，迄于六朝，共为八卷，世贞益为二十八卷。复采唐代至明之作，通为六十卷，又旁搜稗史，得梁、隋以前佚作四十余条，为补遗一卷。”^③补遗一卷的成书动机，其在《尺牍补遗叙》中自序到：“六十卷刻成之后，仍然“意有未尽，旁搜稗史，复得四十条”，从汉元帝《赐婕妤》至孝敬太子《答刑文伟》，差可达到“隋氏之前，无复遗挂。”^④从杨慎《赤牍清裁》十一卷到王世贞《尺牍清裁》六十卷并补遗一卷，王世贞统计全书“凡一千七百五十一条，一十三万一千三百六十二言，前后得六十卷”^⑤，比于杨慎原编，“十益其九”，比于王氏初刻，也已“十益其六”。对此，他自认为可以称得上“瀚博”了。

除了在意对知识的全面丰富性以外，王世贞更强调知识的精准度，以期达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如他在交待《艺苑卮言》的创作源起时说：“余读徐昌《谈艺录》，尝高其持论矣，独怪不及近体，伏习者之无门也。杨用修搜遗响，钩匿迹，以备览核，如二酉之藏耳……手宋人之陈编，辄自引寐。独严氏一书，差不悖旨，然往往近似而未核，余固少所可。……余所以欲为一家言者，以补三

^① 王世贞：《弇州史料》，明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② 王世贞：《尺牍清裁》，明隆庆五年刊本，第4页a。

^③ 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二《集部·总集类存目·尺牍清裁六十卷·补遗一卷》，第1749—1750页。

^④ 王世贞：《尺牍清裁》，明隆庆五年刊本，第605页a。

^⑤ 王世贞：《尺牍清裁》，明隆庆五年刊本，第6页a。

氏之未备者而已。（《艺苑卮言·序言》）无独有偶，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世贞修订并增辑杨慎《赤牋清裁》一书，对于此次修订的缘由和情况，王世贞以自序的书写方式作了简要的说明：“客有斋示余甚旨之第，惜其时代、名氏往往批误，所漏典籍亦不为少。乃稍为订定，仍加增葺，及自唐氏迄今，词近雅驯亦附于后，更为二十四卷，藏之棧中。”^①此次的修订和增葺，是王世贞发现杨慎《赤牋清裁》原书的纸误太多，并且遗憾于书中所收的内容不够广泛，而试图使之完善的一种尝试。

杨慎所编《赤牋清裁》，为明代最早的尺牋选本，原书名曰《赤牋清裁》，王世贞改为《尺牋清裁》，并略作考证：“用修初名‘赤牋’，无所据。或以古‘赤’‘尺’通用耳，考惟汉西岳石阙铭内‘高二丈二赤’，然亦僻矣。且汉所称，尚书下尺一，又天子遗匈奴以尺一牋，匈奴报以尺二牋，皆‘尺’也，故改从‘尺牋’。”^②除书名外，王世贞也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批注及修改，如卷二十二陆玩《与王导》：“杨本作陆琬，误。”^③卫瓘女《与国臣》：“杨本作卫夫人……恒懽子铄，系瓘从女，本传止称瓘女，与国臣书不言卫夫人，恐杨误耳”^④；对于该书的增补效果，王世懋在《尺牋清裁后续》中说得很明确：“家兄元美读而少之，为整齐其次，多所裨益。且使唐宋迄今，片言之长，咸得自附简编之末，彬彬盛哉！赤牋以来，于斯备矣。或者疑用修绝简，未为无意，今之续编，将无以博病精。余谓不然，用修好古之士，裁而患寡，若乃医师择良，有蓄必用；哲匠披沙，在实则获。毋伤古人之调，勒成一家之言。博而能精，又何病焉。即使用修复生，固当不易斯言耳。”^⑤不仅满足了对相关知识的全面搜集，而且还在其基础上达到了知识的精准正确，最终成就了自成一体的学术论著。

在《尺牋清裁》全书六十卷中，第六十卷较为特殊，该卷全收当代名公李攀龙的尺牋，且该卷在李攀龙隆庆四年（1570）去世后的第二年，即隆庆五年（1571）增补完成并付梓刊行。关于该卷的成书原因，其在《与徐子与》中说得很明确：“吾曹二三兄弟，独于鳞渠自万古矣，似不必避标榜嫌也，比亦以于鳞故，增尺牋至六十卷。”^⑥是为了纪念李攀龙而收其尺牋，该卷专收李攀龙短简 32 篇，其中致王世贞的有 26 篇。除此之外，王世贞在李攀龙去世即年增补其尺牋并刊行，是否还存在别的原因呢？我们从其《重刻尺牋清裁小序》中可窥见一二：“于鳞一旦奄成异代，邨简永废，风流若扫。青灯吊影，不无山阳之慨；散帙曝晴，更成蜀州之叹。俯仰今昔，责在后死，高文大篇，勒之琬琰矣。兹欲使间阔寒暄之谈，竿尺往复之致，附托群骥，以成不朽。爰广昔传，未及兹士。”^⑦这段文字看似是在深情怀念昔日共倡复古的战友，但其主观意图也可想见，李攀龙去世也就意味着王世贞接棒捧起后七子复古阵营的重任，一跃成为当时的文章盟主，怎样引导当时的文坛风气以及稳固自己的文坛宗主地位？这一系列问题都促使王世贞急于发出更加强烈的代表文派旗帜性观念的呼声。王世贞也利用自序文这种可以直接表达书籍编选者观点和情感的书写形式，借重刻《尺牋清裁》，重申了“文必秦汉”的文章学习轨范，并以此来捍卫自己后七子领袖的地位。《尺牋清裁》的编刊，客观上也达到了成一家之言的目的，明末清初尺牋选本编刊热潮的

^① 王世贞：《尺牋清裁》，明隆庆五年刊本，第 4 页 a

^② 王世贞：《尺牋清裁》，明隆庆五年刊本，第 7 页 a。

^③ 王世贞：《尺牋清裁》，明隆庆五年刊本，第 8 页 a。

^④ 王世贞：《尺牋清裁》，明隆庆五年刊本，第 8 页 b。

^⑤ 王世贞：《尺牋清裁》后序，明刊本。

^⑥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十八》，四库本，第 15 页 b。

^⑦ 王世贞：《尺牋清裁》，明隆庆五年刊本，第 6 页 a。

一个重要标志是王世贞《尺牍清裁》的盛行。卢恭甫《国朝名公翰藻序》云：“明之书记至嘉隆、万历之岁而愈娴郁可餐，盖自杨用修、王元美两先生勒成之，其书纵横，光烛士林，具载两集中。”^①谈到杨王二书对当时文坛的影响。并且《尺牍清裁》逐渐替代了《赤牍清裁》，成为一时之善本，时人谓“王本出而杨本遂湮灭不传”^②“近世所传《赤牍清裁》，多王王长公益本，杨用修元本绝不复睹。”^③。《清裁》也成为后世尺牍选本的蓝本，如王穉登辑《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万历二十八年刻本）、沈佳胤辑《翰海》（金闾徐含灵崇祯三年序刻本）、徐渭辑《古今振雅云笈》（天启刻本）等明末尺牍选本，所收明以前作品多取资《尺牍清裁》。

关于尺牍观，王世贞在给友人凌约言的尺牍集作序时，进行了完整地阐述了“书牍自东京而上之，其大者宏设广譬，畅利道达，往往足以明志；细至于单辞片情，亦靡不宛然丽尔，彬彬称文质也。晋人于辞事若不甚属比者，毋乃以质掩其文欤？六朝靡靡，沦排偶矣，是则文掩质也。余尝谓晋人工于舌而拙于笔，六朝秣于笔而浅于志，非虚语也。……夫尺牍，以通彼而达己意者也。意有所不达，则务造其语，语有所不能文，则务裁其意，大要如是，足也。”^④籍此确立了“三期七段”的书牍：“三期”即“唐前古体期”“宋体期”和“今体期”，七段为“春秋”“秦汉”“两京以降”“六朝”“唐宋元”“明”。其借这部尺牍集是来推行古文辞的创作法则，代表的是上层精英文人的文学风尚。

二、典范与日用：明中后期尺牍选本的生活书写

明末尺牍文体盛行，是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结果，但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嘉靖、万历年间以来活跃的山人群体^⑤。以冯梦龙、陈继儒、王穉登为代表的山人在明末尺牍选本的出版中表现突出而备受重视。明末山人尺牍编辑以王穉登为代表，《列朝诗集小传》评价其“吴门自文待诏歿后，风雅之道，未有所归，伯谷（王穉登）振华启秀，嘘枯吹生，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⑥，是继文徵明之后的吴门文坛领袖。王穉登的尺牍影响很大，生前就结成专集出版，如《谋野集》《新镌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等尺牍选本。其中，又以《谋野集》刻印最多、流布最广、名气最大：“江阴郁文叔类集而寿之木，属名《谋野》，叙甚悉也。荐绅先生、章缝髦士辈咸脍炙嗜之，业已盛播矣”^⑦前后出版了《谋野集》十卷、《谋野乙集》十卷与《谋野丙集》十卷等选本，呈现出了当时选本流行的情况。此外，屠隆还对《谋野集》加以评释，由种慎堂刊刻成《屠先生评释谋野集》，晚明以迄清初，尺牍选本层出不穷，但专门为当代尺牍作注的却极少，也足以看出该书的流行。同时期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曾因未受赠《谋野集》而两度寄尺牍问难的逸事：“其有语云：《谋野集》盛行，市肆间纸为贵，而不以见惠者，

^① 凌迪知：《国朝名公翰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万历十年刻本，齐鲁书社1997年版，集部313册，第120页。

^② 孙弘祖：《合刻赤牍世说原本叙》，明万历年间吴勉学刻本。

^③ 徐燠：《题陈暹刊赤牍清裁》，《幔亭集》，

^④ 王世贞：《凌玄旻赫曦书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八《文部》，明万历刻本。

^⑤ 关于明代山人群体定义，学界目前尚未有统一界定，笔者参考张德建总结出的山人的三个特征：一、无位者；二、以薄技谋生；三、流动的活动方式。（参见张德建：《明代山人文学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⑥ 钱谦益：《王较书穉登》，《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81—482页。

^⑦ 屠隆：《评释谋野集题辞》，王穉登撰，屠隆评释：《屠先生评释谋野集》，明万历四十七年叶应祖刻本。

将无不欲不佞尺牋小进耶。唯念之。”^①“传街中盛行《谋野集》，乃不以相寄，无虑中郎谈进也。一笑。”^②，从侧面反映出了王穉登尺牋集盛行的情形。

对于《谋野集》刊刻出版的原因，王穉登在给徐茂吴的信中说道：“《谋野》遂有甲、乙两集，不过供肆中贩粥，非谋野，诚谋利耳。”^③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中晚明尺牋选本出版的目的，为了牟利而出版尺牋选本，这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市场的需要，体现出市民阶层的需求。选本按照日常生活的需要将各部分分为不同类别，如《新镌古今名公尺牋汇编选注》一书，根据不同实用场景将尺牋分为请召类、谢辞类、酬谢类、庆贺类等日用类别；陈继儒增补的《新镌增补较正寅几熊先生尺牋双鱼》一书分为通问类、感谢类、借贷类、家书类等类别。并提供相应的撰写模板，如关于立契，陈继儒在《尺牋双鱼》中载有《当田契》和《当屋契》格式，原则性地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实践中，立契还强调立典契人及中见人的署押。验税和过割是法律强求必经的程序，如不税契，除承担刑罚外，“仍追田宅价钱一半入官”；并且还在书中附批注说明契约合同使用规则，如《同本合约》注明“今恐无凭，立此合约，一样二纸，为后照用”，直接指导市民处理经济事务。钟惺、冯梦龙编纂的《如面谈》还提供书信往来的寄出与回复模板，如《贺岁贡》的庆贺模板为：“执事以百炼精金，发迹成均，诚大才晚，成之会也。鷄此驰名天府，不愈于领袖一邦乎，洗耳以听。”^④答复模板为“自愧碌碌庸才，不能赶时释褐。今叨小就，问津壁水，安望天府策命与五百英雄争先也。负惭致谢。”^⑤为满足普通百姓的阅读需要，书中尺牋虽以文言为主，但大量使用浅近文言与口语化表达。如《情郎答书》中“记得去年春夜，与卿握手”^⑥，语言直白生动，贴近市井对话，颇似如今的白话文。甚至部分书信以俚语、俗谚点缀，如《新镌增补较正寅几熊先生尺牋双鱼》解释类《劝人争息》中“安知非嫁祸，者，视为鹬蚌乎？自酌量毋落人圈套”^⑦，借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俗语，语言诙谐，符合市民通俗审美。随着明代商业的发展，商人群体日渐活跃起来，选本中为迎合商业发展与商人需要，专设与商贾往来有关类目，收录雇佣契约书、买卖契约书等，承认商人社交合法性，反映其社会地位提升。还收录了不少与商业情景有关的尺牋，如《如面谈》中《贺人开铺》、《贺开米铺》、《贺开杂货铺》等贺信用“车马洛阳街，利人利己”、“陶朱倚顿，指日可期矣”^⑧等词，展现商业繁荣，有利可图的景象，甚至还出现《贺弃儒为商》契合商人阶层的审美趣味的祝贺书信。通过书信模板的传播，市民阶层形成了一套区别于士大夫的话语体系，如称商人妻为“宝眷”、店铺为“宝号”，发出了市民阶层的声音。

此外，受市场需求的刺激，万历、天启年间，还出现了一批专门编纂和刊刻尺牋类图书的书商，王世茂车书楼就是一个典型，他编纂、校注或刊刻了如《车书楼汇辑各名公四六争奇》、《车书楼选刻历朝翰墨鼎彝》、《尺牋争奇》等至少二十余种尺牋类图书。这类尺牋类读物也是以平民大众为读者对象，为此书坊和编者都尽力使文本通俗易懂，如《尺牋争奇》凡是人名、地名和典故基本上都

^①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八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刻本。

^②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二百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刻本。

^③ 王穉登：《与徐茂吴》，王穉登：《谋野丙集》卷十，自鉏园刻本。

^④ 钟惺、冯梦龙：《如面谈》，明刊本，日本内阁图书馆藏。

^⑤ 钟惺、冯梦龙：《如面谈》，明刊本，日本内阁图书馆藏。

^⑥ 钟惺、冯梦龙：《如面谈》，明刊本，日本内阁图书馆藏。

^⑦ 熊寅几：《新镌增补较正寅几熊先生尺牋双鱼》，明刊本，日本内阁图书馆藏。

^⑧ 钟惺、冯梦龙：《如面谈》，明刊本，日本内阁图书馆藏。

有注释。不管是山人群体还是以王世茂为代表的车书楼书商,其选本照应了市民大众日常交往的需要,一定程度上是谋利的产物。作者身份、阶层等个人因素决定其尺牍思想、内容与艺术高度,反之,尺牍为作者社会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商业性、模版化的尺牍选本也在另一层面参照出其编选者久困屋场的底层文人形象。

三、从士林到市井:中晚明书仪的民间书写

书仪,顾名思义,是写信的范本。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都被归入史部仪注类。可见,书仪与礼互为表里:“书仪”为表,是礼的载体与具象;“礼”为里,是书仪的内核与依归。正如美国学者斯特伦(Frederick J. Streng)所言,礼是“适宜的社会行为,不仅仅是社会的习惯,而且还是深藏于一切之中的生活法则的社会表现”,^①在书写领域的礼就表现为书仪。

从魏晋到隋唐再到明代书仪,作家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为以士族主宰的门第社会所重,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②。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吉凶书仪大都出自高门世族之手。六朝书仪礼法显示地位、身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书仪的书写权利控制在世家大族手中。到了唐代特别是唐朝中后期,书仪作家群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以官位高低为准则进行书仪的撰写,例如,唐前期乃至中唐吉凶书仪的作者如卢藏用、杜友晋、郑余庆等大多是旧族人士或中央官僚。世族出身的大官僚郑余庆,也已经是“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③。明代中后期,坊间逐渐形成了编刊尺牍总集的风尚,并且出现了以尺牍编刊而自成特色的书坊及选家,金陵书坊车书楼就是其中的代表,车书楼经营出版活动近三十年,编刊多类书籍约四十种,其中尺牍选本的编刊占一半以上,参与该书坊编辑活动者多达三四十人,张献忠称其为“车书楼群体”,此群体具有鲜明的“底层”色彩,多被研究者称为“底层文人”“底层文士”^④。此时的尺牍选本受编纂者主观思想、动机以及民间日用双向互动的需要,呈现出强烈的模板化活套特征,给平民大众提供了撰写书信的范式。

书仪作家群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文化下移特征,那么,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思想的开放与包容,明中后期出版的商业化使其具备了大众传播的某些属性,引发了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打破了两千多年来精英文化居于绝对霸权地位的一元化、单线性的文化生态模式,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化与知识的下移,使明中后期形成了“主流文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非主流文化”(以启蒙思潮为主体)和“市民文化”三足鼎立、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格局。^⑤同时,传统四民说的格局被打破,如归有光写道“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士与农商常相混”吸引知识分子主动参与通俗文化与出版物的商业化。^⑥其次是明中后期商业发展,尤其是出版业的发展,使得大批量的图书出版成为可能。朱明一代为中

^① (美)斯特伦著,金译、何其敏译:《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

^③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五《刘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32页。

^④ 参看张献忠:《科举竞争压力下底层文人的职业选择及其生存境遇——以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形成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5—12页;《晚明底层文人的生存状态——以南京王世茂车书楼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第65—71页;任利荣:《上下融通:晚明商业出版大爆炸中的士人群体——以南京车书楼为中心》,《历史文献研究》2020年第2期,第255—268页等。

^⑤ 张献忠:《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与文化的下移》,求是学刊,2013年第2期。

^⑥ 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国书籍编纂刊印鼎盛时期，数量之多，工艺之巧，形制之多样，莫过于明代。

其编纂刊印书籍有官私之分，藩府坊肆之别；其刻书区域之广泛遍及大江南北，又多形成地域性之刻书中心；其印制工艺之变化多样，亦非前代任何一朝所能媲美。^①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记载的图书以明代为主，全书按照经史子集分类，共 32 卷，收书 15600 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这本书评价极高，认为“考明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所以钦定《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②《明史·艺文志》所载图书 5033 种，该书只收明代人的著作，未涉及到其他朝代书目在明代的刊行出版，但明代著述之盛从中可窥一二。据统计，《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古籍 56790 种，其中明版书有 23042 种；近人杜信孚编纂的《明代版刻综录》中收录了图书 7876 种。总体而言，明代统治者对出版的管理相对轻松，致使出现了我国出版史上的活跃时期，明代出版图书总共在 3.5 万种左右^③，数量之多非其他朝代所能比拟。然后是商业环境中社会大众交往的需要，尺牍选本大量刊行，商人书信逐渐成为选本中的重要类别，为商人和手工业者提供书信是大部分选本中的重要内容。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且邮驿系统只有少部分人使用，商人常年在外交商，他们只能通过书信和家人、朋友进行沟通，如《如面谈》中记载的父外寄子书“父平安，字示男某：自我出门，路上颇安，寓所亦便，不须男远虑也，但家务事要节俭勤谨，切勿奢侈怠惰。汝母好生奉养，汝弟尤宜教训。门户早宜关闭，火烛最宜谨防，诸亲紧要吉凶事情，酌可而行。如此方是成家子。我今所务，未有完结，俟一完结，即速归家。人便附字，寄有银物，少资家用，倘或不给，亦烦那移将就。待我归处，如有便人，家事当详写报我一信”^④是父亲在外寄给家中长子的书信，报平安、问家里，最后要求回信，并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明代书信大多还是靠同乡、亲戚朋友等顺路传递。甚至明中后期类书专门辑录尺牍知识的“启札门”中很大一部分也是为商人和手工业者写信提供指导，如《新镌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卷八《启札门》中共收录了 30 篇书信范文，其中商人与家人、朋友的书信往来就有 12 篇之多^⑤。这些书信不仅是商业活动的实录，更是透视明代社会变迁的“显微镜”，从中可窥见一个逐渐崛起的商人阶层如何通过文字参与历史书写，如何在历史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四、谁在说话？知识和权利的共谋所决定的话语。

狭义的话语权是指主体所拥有的说话权，广义的话语权指福柯和布迪厄所说的“权力话语”、“权力语言”，话语权的背后折射的是一种权力的比较，是一种权力的权衡，所以每一次话语的表达都被视为一次权力行为。而且这种话语的表达抑或权力的行使都具有一种倾向力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⑥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一书的“中心命题”是谈“自 16 世纪中叶至 1644 年明朝灭亡的这段历史时期内，物质世界的产品与掌握权利的社会士绅所认同的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这是士绅阶层特别关注的问题。……这部分是通过互相影响的社会活动而实现的；另一部分则是通过士绅圈子内出版、销

^① 赵前编著：《明代版刻图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年，第 1 页。

^② 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第 732 页。

^③ 缪咏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5 页。

^④ 钟惺、冯梦龙：《如面谈》，明刊本，日本内阁图书馆藏，第 5 页 a。

^⑤ 张献忠：《日用类书的出版与晚明商业社会的呈现》，江西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2 期。

^⑥ 张献忠：《文社、书坊与话语权力——晚明商业出版与公共空间的兴起》，学术研究，2015 年第 9 期。

售和流通的文本生产反映出来”。文学文本除了受官方话语的渗透，还受社会生活、时代导向的制约。在文学批评与传播领域，选本不仅是尺牍文体批评与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成为选家及其交游圈相互标榜、介入自撰作品批评与传播进程的文化策略，尺牍因此而被赋予丰富的意涵。^①尺牍选本视为“话语权战场”，揭示明代文学权利从庙堂（官方）向文人集团、商业出版乃至地方社会的下沉与分化。在中晚明古今书牍出版潮中，各色人等都力争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便争夺话语权或获取经济利益。那么，选本编纂是如何通过筛选、评点、传播确立特定文学标准，进而主导批评话语的呢？

明初朱元璋创设的一代礼制，从衣、食、住、行以及社交礼仪诸方面，确立了一代生活准则，关于书信写作的格式也不例外，洪武五年十二月宣布：“上谓礼部臣曰：‘今人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皆非实礼。其定为仪式，凡致书于尊者，称‘端肃奉书’，答则称‘端肃奉复’；平交者，则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则称‘书寄’‘书答’。‘卑幼与尊长，则曰‘家书敬复’；尊长与卑幼，则曰‘书付某人’。毋得滥用‘顿首’‘再拜’字样，以乖礼体。’”^②禁止在私人往来书信中使用“顿首”“百拜”等恭敬套语，认为其“非礼也”，这一政策，从国家制度的层面断绝了市民百姓在私人通信方面使用相关礼仪规范的途径，将书信之礼控制在少数人手中，流通范围局限在小部分领域。

王世贞《尺牍清裁》作为明代第一部通代类尺牍选本，该书以“清”为特色，以雅玩复古为编纂原则，致力于打造一部后世学文者的范本，而不是为广大市民阶层提供书信的写作模板，与明中后期尺牍选本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其代表的是上层精英士大夫的审美风尚。皮埃尔·布迪厄指出“品味不仅反映阶级差异，而且作为一种工具建立和维持了这种差异”^③建立差异不仅具有分别社会角色的功能，也可以使规则的制定者从中获利，如王世贞在《觚不觚录》中说道：“画当重宋，而三十年忽重元人，乃至倪瓒以逮沈周，价骤增拾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④诠释了士大夫集团在文化品位确定中的主导地位，古代社会，书画作品一方面是观赏艺术品，而更重要的方面是作为文人士大夫用来标榜雅玩、格调的工具。《汉书·游侠列传》中关于陈遵的传记记载到：“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⑤说明从汉代开始，书信中显示艺术性的一面已经被人们重视，并纷纷将其作为艺术品加以收藏。王世贞也不例外，看中尺牍书法性的一面，在编选选本时有意识地选择性收录书法名作，如《尺牍清裁》卷二十五至二十七为“二王尺牍”，其中包括王羲之尺牍共101通，为全书收录单人作品数量之最，王献之尺牍16通。以王羲之为例，董其昌在《书禅室随笔》中赞：“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⑥其《兰亭集序》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关于王羲之尺牍，学界目前已有相关研究，认为其以尺牍名世，是因其书法艺术性，

^① 蔡燕梅：《明末山人尺牍集的编刊及其文献价值》，印刷文化（中英文），2024年第3期。

^② 朱国祯辑：《皇明史概存》，明崇祯刻本，第30页b。

^③ Pierre. Bourdieu（皮埃尔·布迪厄），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6.

^④ 王世贞：《觚不觚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67页。

^⑤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711页。

^⑥ 毛万宝：《中国古代书论类编》，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41页。

具有特殊性。^①王世贞收录王羲之包括《兰亭集序》在内的相关尺牍作品，也有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其晚于《尺牍清裁》十几年编撰的《古今法书苑》^②又为一大力证，该书的编纂目的是使“学书者如学文”。

明代中后期尺牍选本以及日用类书中的尺牍部分很大一部分也是为市井大众提供写信指导。明代的教育虽然很发达，百姓识字率有所提高，但大多数市民百姓的文化水平有限，仅粗通文墨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阅读障碍。基于此，很多尺牍信息都有大量的说明注释。如《新镌增补较正寅几熊先生尺牍双鱼》中“通问类”未会瞻仰其二“足下，名声籍甚”，注释到“足下，称足下，叶之也。名声籍甚，籍甚，言声名之美。”^③甚至在家书中也加入了不少注释，如《如面谈》中“子外寄父书”中“别亲膝下，俛尔月余每思高堂垂白。”^④注释到“人子生亲膝下一体而分”、“父母暮年发垂白也”使人一读便知晓其中意思。与此同时，编纂者根据自身需求与好尚从《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中选取作品，又将之与从其他渠道所得作品汇合，或以类相从，或“随到随刻”，注释条目及详略程度不一，种种举措，似有意遮蔽剿袭痕迹，从而制造出“穷搜博采”的表象。这类书籍因迎合时人的文体阅读需求而迅速畅销坊间，一定程度上对《尺牍清裁》的典范地位造成冲击。大木康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微妙变化，他在《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一书中写道：“文人趣味中国古来就有，但以往一直处于贵族或士大夫文化的‘高高山顶’；而到了明末这类高雅生活指南（按：指陈继儒编纂的普及文人趣味的通俗书籍）蜂起，在更广范的社会阶层中普及开来，文人雅趣弥漫到了市井巷陌。”^⑤体现出了文化下移，市民在明中后时代浪潮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是，明代尺牍选本中丰富的民间话语，在清代遭遇了系统性断裂。乾隆朝借编修四库全书系统清除明代尺牍中的“异质”民间话语，将尺牍文体规训为符合程朱理学的“雅正”载体，如《尺牍兰言》声明“凡酬应琐屑之习，淘汰务尽”^⑥；《秋水轩尺牍》《雪鸿轩尺牍》等清代尺牍选本几乎完全剔除戏谑讽刺内容，转向庄重典雅的应酬用语。这种断裂不仅是文本内容的删改，更是文化生态的转型——从明代的多元、市井、批判，转向清代的雅驯、正统、实用。

结语

宋元至明前期，商业出版开始逐渐走向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大众，但仍以精英阶层为主，属于一个过渡时期。在晚明，尽管士商相混动摇了传统的社会价值系统，出现了“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的反常现象，但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士绅阶层仍是通过各种教化途径使得旧有的价值系统摇而不坠。^⑦晚明社会还是一个“旧”的社会，其中所孕育的“新”的东西还不足以将其完全瓦解或代替，所以话语权的民间话只能是转向。这种转向不仅是晚明商品经济勃兴

^① 参看祁小春：《迈世志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② 关于两书编纂的关联性可参看梁达涛：《〈古今法书苑〉编纂动机及体例初探》，书法研究，2023年第3期。

^③ 熊寅几：《新镌增补较正寅几熊先生尺牍双鱼》，明刊本，日本内阁图书馆藏。

^④ 钟惺、冯梦龙：《如面谈》，明刊本，日本内阁图书馆藏。

^⑤ （日）大木康：《明清文人的小品世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42页。

^⑥ 黄容、王维翰：《尺牍兰言》自序，清刊本，日本内阁图书馆藏。

^⑦ 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5页。

下市民文化崛起的投射，更折射出文学权力下移过程中民间话语力量的生长。然而，清代乾隆朝推行的文化整饬政策，尤其是对民间尺牍选本的禁毁与规训，造成了这一转向的断裂：朝廷通过编纂《四库全书》禁行尺牍文本，斥其“文格卑弱”、“有乖雅正”，最终导致文学话语权再度向权力中心聚敛。